

第一章 墨经逻辑的地位与价值

墨经逻辑在中国逻辑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世界逻辑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墨经逻辑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科学真理性，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值得深入研究，需要大力弘扬和普及。

第一节 中国古代逻辑的光辉典范

爱因斯坦在谈到西方科学发展的两个基础（演绎逻辑体系和探求因果联系的方法）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来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① 爱因斯坦所说的形式逻辑体系即体现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实质公理化方法，是一种逻辑的应用，它的理论形式是由亚里士多德建立的演绎逻辑系统。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在中国的思想家包括墨家的著作中没有，但是，如果说辩证逻辑或者

^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574 页。

非公理化的形式逻辑理论在中国却未必没有。

李约瑟博士也曾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①李约瑟在这里对中国思想中源远流长的辩证逻辑和辩证思维方法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李约瑟还给中国古代文化提出了一个类似数学史上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即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个问题一直在影响着大批中国文化研究者的思路。美国知名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论及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的问题时认为：“科学发展的另一阻碍在于中国学者未能制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②近代科学革命没有能够在中国发生，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没有创造出完善的逻辑体系可以肯定地说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是否可以说，中国就没有逻辑思想和逻辑理论，作为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的墨经逻辑就不存在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爱因斯坦、李约瑟、费正清等学者都没有否定中国存在逻辑，他们仅仅指出了，中国逻辑没有达到形成“形式逻辑体系”即公理化的高度，“中国人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中国没有制出一个完善的逻辑系统”。但是，中国逻辑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和程度，他们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说明，这就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中国或墨家为什么“没有制出一个完善的逻辑系统”？我们说，墨家之所以没有制出一个完善的逻辑系统，可能与中国当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发展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古希腊柏拉图学园的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不懂几何者禁入。”希腊人把数学思想当作进入哲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45 页。

②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3 页。

学入门的阶梯。在亚里士多德创立演绎逻辑体系时，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中国先秦时代的数学或几何学比较起来尚有很大差距。《墨经》有关于“圆”的定义，有关于点（端）、线（尺）、面、体之间关系的思考，但始终没有形成公理化的体系。当然，数学、逻辑理论上存在的差距又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直接相关，尤其与数学或逻辑的表达工具——语言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中国或墨家没有能够制出一个完善的逻辑系统，从而未能对中国文化及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这与中国社会后来发展的特殊性更为密切相关。墨经逻辑不完善，但它本身尚可以发展。印度的古因明就是从足目的逻辑思想发展而来的，公元5世纪陈那又将古因明发展成为以因三相为核心的新因明逻辑理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形式的，但并不是形式化的。而斯多葛逻辑则既是形式的，也是形式化的。斯多葛逻辑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国社会到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儒学上升为经学和神学。墨学非儒反孔，其兼爱说不利于封建宗法统治，被官方视为异端邪说而加以排斥。这样，在先秦时代曾与儒学并称显学的墨学，由于不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归于衰落。墨经逻辑在秦汉以后也随着墨家和墨学的衰微而渐被埋没。封建专制是墨经逻辑得不到继续发展的直接原因。

墨经逻辑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逻辑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孙诒让说，墨经逻辑“为周名家言之宗”，是中国古代逻辑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3页。

的根本。胡适说：“六篇《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①称《墨经》作者提出了一种高度发达的和科学的方法，是伟大的逻辑学家，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谭戒甫说：《墨辩》开“华夏二千年前独到之辩学”^②。沈有鼎说：墨经逻辑“代表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光辉成就”。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到了《墨经》，就同登上高峰一样”^③。

墨经逻辑对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直到汉晋思想家都曾经产生过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墨经逻辑，就不可能引发各家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思考，墨经逻辑直接影响了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晋代学者鲁胜曾有过具体的叙述，他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墨辩注序》）近代胡适也强调指出：“从此以后，无论那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荀子的《正名篇》虽攻击当时的辩者，其实全是墨学的影响。孟子虽诋骂墨家，但他书中论方法的各条，无一不显出墨学的影响。庄子的名学，也是墨家辩者的反动。至于惠施、公孙龙一般人，都是直接的墨者，更不用说了。”^④虽然上述二位学者认为惠施、公孙龙是墨者的主张不能成立，鲁胜认为《墨经》为墨子所著也未必正确，但是他们都真实道出了墨经逻辑对各派思想家的重大影响。

例如，荀子在逻辑上批评墨家“杀盗非杀人”的命题是“惑于用名以乱名”，但是墨经逻辑对荀子的积极影响却是十分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6 页。

② 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1 页

③ 《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3 页

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0 页。

巨大的。《大取》篇说：“夫辞以故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即论题凭借论据而产生。建立论题而不明其所赖以产生的论据，会带来妄谬。荀子也说“持之有故”、“辩则尽故”，即坚持论题应有充分理由，辩论、议论应揭示支持论题的各种论据。再如，墨经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黄帝内经》，该书说道：“欲知其病，必问其故。”强调了解事物的原因是认识事物的根本。这与《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的思想是一致的。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 墨经逻辑的中衰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缺憾。由于墨经逻辑的缺席，中国文化就像失去了一个翅膀。胡适深有感触地说，“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②，“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③ 中国的文化和思想总的来说缺乏体系、缺乏逻辑论证，这不能说与墨经逻辑的被埋没有重要关系。墨经逻辑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理论思维特征的文化珍品，理应得到充分重视和发展。梁启超对此也感慨地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④ 梁氏在此也道出了研究和弘扬像墨经逻辑那样的理论思维或逻辑思维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67 页。

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 页。

同上书，第 9 页。

^④ 梁启超：《墨子学案》，第 65 页。载《饮冰室合集》第八卷，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第二节 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

以墨经逻辑为典范的中国古代逻辑，是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

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于公元前 4 世纪创立了以词项逻辑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演绎逻辑，其主要文本包括《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等六篇论文，这些论文在公元前 1 世纪由史学家安德罗尼可编为《工具论》一书。古希腊的斯多噶学派则在公元前 3 世纪创立了古典命题逻辑。

在印度，公元前 2 世纪足目所著的《正理经》包含了丰富的逻辑思想。公元 5 世纪陈那著《因明正理门论》一书，创立了以因三相为核心的新因明逻辑理论。

墨经逻辑由公元前 5 至前 3 世纪的先秦墨家学派创立。其主要文本是现存《墨子》53 篇中的第 32 到 37 篇，即《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合前四篇称狭义《墨经》，合六篇称广义《墨经》，又名《墨辩》。

墨家是先秦重要学派之一。其创始人为墨子（约公元前 480—前 420）。墨家与儒家一起在当时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司马炎在《论六家要旨》中列墨家为先秦六大家的第三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①。《庄子·天下》篇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这是“墨经”一名目前可见的最早出处。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941 页。

逻辑产生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墨子非常重视“谈辩”，把它看成是“为义”三事之首。《耕柱》篇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小取》篇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察名实之理，明同异之处，处利害，决嫌疑。”墨经逻辑根植于先秦百家争鸣的需要，是墨子及其后学为了培育传人的需要，通过总结百家争鸣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所形成的系统逻辑理论。

墨子在辩论实践中，认识到了“以见知隐”、“以往知来”的推理之知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察类”、“明故”对于思维论证的重要性，为墨经逻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狭义《墨经》四篇以“故”为《经上》的第一条，以“类”的思想为《经下》的第一条，对墨子所开创的逻辑思想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大取》揭示了墨经逻辑关于“立辞”正确性的“故、理、类”三个方面的要求，《小取》对墨经逻辑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狭义《墨经》四篇除了包括逻辑思想之外，还包括有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生理学、教育学、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力学、光学等内容；《大取》除了逻辑思想之外，还包括有伦理学等内容；《小取》则建立了一个以辩为中心的逻辑系统。这个系统包括“辩”的性质、方法、原则、要求，逻辑推论的基本方式或方法，推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逻辑错误等。

值得注意的是，《墨经》中已经包含着应用元语言来表达的逻辑规律，如《经说上》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等，其中的代词“之”、“然”等都起着变项的作用。墨家在这里的讨论包含了论证的论据与论题，即推理的前提与结论间的必然性关系，即必然得出的关系，表明墨经逻辑已经不局限于思维内容而开始进入形式逻辑领域，《墨经》已经不限于应用逻辑，同时也讨论了逻辑理论。

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成了非常完善的逻辑系统。而产生

于印度的因明和古代中国的墨辩，都曾为人类的推理和论证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荀子《正名篇》说：“凡同类同情者，其天观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同样的人类，有同样的材质，面对同样的世界，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概念，遵守同样的逻辑。杨百顺教授在此基础上指出：“有人说各国都面对同样的天空，因而有同样的天文科学出现。我们可以说，各国逻辑家不仅面对同样的天空，也面对同样是指号的，可互译的语言，同样在思维，同样在交际（论辩、辩讼、交往等），又有同样的或类似的各方面的背景。因此世界三大逻辑除了具有各自侧重点及民族习惯用语及语法特色外，又在主要内容上相通，都研究了（或涉及）概念、判断、推理（演绎、归纳、类比）、论证及逻辑方法、逻辑规律。”^①毋庸置疑，语言形式有民族性，而隐藏在不同语言形式背后的逻辑学的真理则具有世界性、全人类性。

墨经逻辑具有普遍性和全人类性。梁启超在《墨经校释·自序》中指出：“在我国古籍中，欲求与近世所谓科学精神相契合者，《墨经》而已矣”，认为《墨经》的内容“与近世西方学者所发明，往往相印”，把《墨经》看作“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墨经逻辑的第一个优点，是“有学理的基本”，“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如‘故’的观念，‘法’的观念，‘类’的观念，‘辩’的方法，都说得很明白透彻”；其第二个优点，是“能把归纳演绎一样看重”，“深知归纳法的用处”，“故能成一科学的学派”，充分肯定了墨经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独特贡献。章士钊说：“逻辑之

^① 杨百顺：《比较逻辑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48页。

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①“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②逻辑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沈有鼎认为，“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和逻辑形式”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企图证明中国没有逻辑学，或者说中国人的思维遵循着一种从人类学术康庄大道游离出来的特殊逻辑”^③是不对的。沈有鼎说：“《墨经》一书本来是奇书，以一书而兼讨论数学、力学、光学、经济学、逻辑和认识论诸问题，实在是世上少有。”^④“奇”是罕见、特殊、非常、出乎意料、令人惊异之意。墨家与儒、道、名、法、阴阳诸家都是先秦的重要学派，但像《墨经》这样的逻辑和科学著作，在全部诸子学中堪称一“奇”。而沈有鼎所说《墨经》中“数学、力学、光学、经济学、逻辑和认识论”的真知灼见，则是对古今中外都带普遍性的学问，从而肯定了墨经逻辑所具有的共同性和全人类性。

当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语言文化背景有异，墨经逻辑也有其特殊性和个性。正如沈有鼎所说：“中国语言的特性就制约着人类共同具有的思维规律和形式在中国语言中所取得的表现方式的特质，这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使其在表达方面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⑤但是，个性中有共性，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列宁指出：“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⑥墨经逻辑是中国古人的原创成果，它包含了许多对古今中外都有普遍性意义

① 《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现代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7 页。

② 同上书，第 308 页。

③ 《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77 页。

④ 同上书，第 585 页。

⑤ 同上书，第 377 页。

⑥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01 页。

的真理。有论者认为，墨家“辩学与逻辑”“目的、对象、性质、内容均不同”，“是两回事”，“辩学就不是逻辑”^①，认为墨经逻辑仅仅是某种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显然，这种过分强调墨经逻辑的个性和特殊性，不注重其共性和一般性的观点，与那种过分强调墨经逻辑的共性和一般性不注重其个性和特殊性的观点一样，都具有片面性，都是不足取的。实际上，西方逻辑也有其特殊性和个性，亚里士多德逻辑就深受古希腊语言和文化的影晌和制约，但亚里士多德逻辑仍然具有全人类性。

墨经逻辑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与西方逻辑相比，墨经逻辑着重研究了类比推论，它与西方逻辑中所讲的类比推理不同。“古代中国人对于类比推论的要求比较高，这是因为在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类比推论有着极广泛的应用。”^②《墨经》对类比推论的研究比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都要广泛得多。墨经逻辑研究了大量的关系命题和关系推理，它们都是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和传统逻辑不曾考虑的。例如，《小取》说：“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这是“侷”式推论中“是而然”的情形之一。像这样的推论问题，只有到了现代逻辑中的谓词逻辑才可能得到比较清楚的解释和比较彻底的解决。这就是说，《墨经》中所讨论的许多逻辑问题，也许在西方传统逻辑或者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得不到解释，但它可以在现代逻辑中得到解释，有些问题也许在今天还得不到完满的解释，但总有一天会得到解释。“要澄清、理解、阐明历史上的逻辑思想，使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发扬光大，光靠传统逻辑肯定是不够用的，甚至加上数理逻辑的两个演算也许还是不够用的，还需要有哲学逻辑和自然语言的语义分析等方面提供

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9、32、4 页

② 《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6 页。

的逻辑工具。”^①对于墨经逻辑中的某些理论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用传统逻辑工具或者用数理逻辑中的两个演算解释不了就断定它不是逻辑问题。墨经逻辑的特殊性对于丰富全人类的逻辑理论来说比其普遍性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总之，以墨经逻辑为典范的中国古代逻辑，是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并列的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是世界逻辑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逻辑所研究的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是任何正确认识和任何科学都必须应用和遵守的，因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正确地反映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逻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不同个人的逻辑。但是，另一方面，逻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总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和某些个人的产物，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因此，在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逻辑体系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即中国逻辑传统、印度逻辑传统和希腊逻辑传统。”^②

墨经逻辑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对墨经逻辑这一优秀成果，应该向世界弘扬，使之成为中外逻辑连接融会的桥梁。

第三节 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化接轨的桥梁

我们肯定墨经逻辑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也必然肯定其现代价值。因为逻辑学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它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行诸百世而不悖，对全人类具有永久性的意义。

弗雷格认为，逻辑是关于真的学问。他说：“正像‘美’这

^①《事物求比——沈有鼎及其治学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2 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35 页。

个词为美学、‘善’这个词为伦理学指引方向一样，‘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① 墨经逻辑也是探求真理的工具。《墨经》把真叫做“当”，假叫做“不当”、“悖”等。《经说上》说，“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不俱当”；“必或不当”。辩论双方围绕同一个对象，一个说“这是牛”，一个说“这不是牛”，二者必有一个符合事实即当，在辩论中能够取胜，而且必有一个不符合事实即不当。《经说上》说：“信，不以其言之当也。”《经上》说：“信，言合于意也。”一个判断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叫当，一句话可信并不要求它所表达的判断必须符合事实，只要求它忠实地表达判断就行了。《小取》说，“摹略万物之然”，就是要认识事物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即认识客观真理。例如墨家总结出来的“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彼此止于彼此”等命题，就是他们所认识到的逻辑真理。梁启超说：“墨子之论理学，非以骋辩才也，将据之以研究真理，而树一坚确不拔之学说也。”^② 在梁启超看来，墨经逻辑与诡辩派的徒骋辩才，以求词胜，而不顾事实的诡辩，决不可同日而语。胡适说：“墨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③ 沈有鼎指出，《墨经》作者总结了古代中国的科学，“把这科学所使用的一些方法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并反过来推动科学的发展”^④，认为墨家的“辩”是“明是非之分”的必要工具，肯定墨经逻辑是认识科学真理的方法^⑤。

^① [德]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113 页。

^②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附墨子之论理学》，第 63 页。载《饮冰室合集》第八卷，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9 页。

^④ 《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76—377 页。

同上书，第 394 页。

墨经逻辑是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具有行诸百世而不悖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它完全可以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胡适认为，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现在中国已与世界的其他思想体系有了接触，近代中国哲学中缺乏的方法论，可以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和科学方法来填补。而最有效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应该与中国自己的文化联结起来。在中国古代的非儒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西方现代哲学的最重要贡献，都可在古代非儒学派中找到遥远而高度发展的先驱。因此，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互相解释，可以利用和借助于中国哲学中许多已失去的财富^①。在胡适的心目中，墨经逻辑正好可以充当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汇融合的联结点或桥梁。这就在根本上肯定了墨经逻辑的现代价值。

有人说，中国逻辑在先秦，秦汉以后无逻辑。如果仅就这句话的合理性来说，先秦时代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讨论逻辑问题的高潮时期。以墨经逻辑为典型的中国古代逻辑正是对当时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成果的总结，同时又对当时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秦汉以后，墨经逻辑随墨家和墨学的衰落而渐被埋没，先秦时代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基本上没有发生作用，更谈不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虽然也有像鲁胜那样恢复“绝学”的决心，但也仅此而已。中国秦汉以后的文化和思想总的来说缺乏逻辑体系、缺乏逻辑论证。

既然中国自己的逻辑思想被埋没，没有得到研究，更谈不上发展，而中国近代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又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这样就需要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逻辑思想和科学方法来填补。其实，在近代以前中国曾经

^① 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 1983 年版，导论。

两次输入外国的逻辑思想。一次是在初唐，唐玄奘自印度游学归来，翻译了从印度带回来的陈那和商羯罗主写的因明著作，并向弟子讲授，其弟子仔细揣摩，撰写了多本注疏，一时间，研习因明蔚然成风，中国因而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另一次是在明末，明朝官员李之藻和傅汎际合作翻译《名理探》（原名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是 17 世纪初葡萄牙的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会士的逻辑讲义），该书历时 5 年，终于在 1631 年刊刻行世。可以说，上述两次外国逻辑输入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作用。唐玄奘及其弟子翻译、撰写的因明著作，在唐玄奘死后不久即已失传，千余年后才由近人杨仁山从日本觅回。《名理探》的情况更惨，该书刊刻后很快就杳无踪迹，以至三百年之后国内公私藏书中都很难找到一部。直到 20 世纪初，才由陈垣根据徐家汇藏书楼的抄本影印了前五卷，30 年代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又根据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藏的抄本排印，后人才知道数百年前西方的逻辑已经输入我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逻辑再次输入中国。严复翻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系统地把西方的逻辑学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其他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章士钊等也参与翻译介绍西方的逻辑思想。此时的情况与前两次外国逻辑思想输入时大大不同了，此时的逻辑学被视为扶危济困、救世安民的良药和工具。逻辑学的成功输入和引进，也使它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作用，成为中国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学术由于吸收了逻辑的成果和方法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定义和划分的运用，推理和论证的讲究，成了现代学术著作有别于古代学术著作的一大特色。”^① 这

程仲棠：《逻辑要与中国现代文化接轨》，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4 期，第 21 页。

一时期，逻辑学在中国可以说呈现了继先秦之后的又一次辉煌。在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一次西方逻辑在中国得到了比较成功的输入，并且发生了比较大的作用呢？这除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学术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以墨经逻辑为典型的中国古代逻辑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梁启超、胡适、章士钊、沈有鼎等人就是通过研究中国古典逻辑来介绍引进西方逻辑的，正是通过他们对中西方逻辑思想的比较研究，西方逻辑才逐渐在中国普及并传播开来的。有人在评价中国近现代逻辑比较研究的作用时说，中国近现代逻辑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促进了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①，单就这一点来说，上述评价是需要肯定的。西方逻辑在中国近现代的传播和普及的历史表明，西方逻辑必须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结合起来，融合在一起，才能在中国文化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今天，逻辑学在中国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许多大学把逻辑学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有了逻辑学博士点和硕士点，培养了逻辑专业人才，逻辑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总的来说还是令人堪忧的。目前，我国得到普及和推广的主要是传统逻辑而且也正在大规模地萎缩，现代逻辑则主要还是在少数几个学术精英中转圈子。许多从事逻辑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没有受到应有的现代逻辑训练，许多大学哲学系没有开设现代逻辑的课程，许多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硕士、博士居然没有学习过逻辑，国外的情况不是这样。“在英美国国家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现代逻辑成为大学哲学系、语言学系等文科系里的必修课。”“在美国，对于哲学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① 参见崔清田、张斌峰：《近代墨辩比较研究法的回顾和反思》，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第13页。

还有明确的更高的要求。”^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逻辑学和哲学研究工作者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现代逻辑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如何使西方逻辑中国化，如何真正实现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接轨，依然是广大逻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如何使现代逻辑的成果为我所用呢？如何才能使现代逻辑方法真正成为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分析问题的重要方法呢？我们又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现代逻辑的优秀成果呢？张清宇研究员在《邓析“两可之说”的弗协调逻辑态度》一文中给了一个较好的回答。他说：“摆脱传统的协调性束缚，充分了解现代西方逻辑，从整体上来认识现代西方逻辑，一定能提高我们对先秦逻辑的总体认识。反过来也一样，对先秦逻辑的正确认识也一定对我们认识现代西方逻辑有所启发。”^② 深入研究以墨经逻辑为典型的中国古代逻辑，对于我们把握理解现代西方逻辑是有意义的。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开考的 MBA（工商管理硕士）逻辑考试，主要是参考了美国研究生院 GMAT、GRE 和 LSAT 考试中的逻辑考试方式。这种逻辑考试在西方叫做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或 *analytic reasoning*（分析性推理），又称非形式的逻辑（*informal logic*）。这种逻辑主要是关于人们日常思维与科学推理中的逻辑学科。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这种非形式的逻辑与我国古代的墨经逻辑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可以被看作关于思维论证的逻辑。《墨经》中提出的“辟”、“侔”、“援”、“推”等推论方式完全可以用来分析国外

^① 王路：《走进分析哲学》，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316 页。

^② 《摹物求比——沈有鼎及其治学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6 页。

的非形式的逻辑问题。例如：关于归谬式的类比推论“推”，《小取》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所取者，予之也。”为了反驳对方的主张，选择一个与对方的观点是同类的，却又是荒谬的、连对方也不可能接受的命题，进而证明对方的主张是不成立的。其推论形式如下：

被反驳的命题：A

证明：(1) 设 A 成立；

(2) 如果 A 成立，则 B 也成立；

(3) 并非 B；

(4) 所以，A 不成立。

对方“所取”的是 A，对方“所不取”的是 B，即非 B。然而既然 B 和 A 是同类的东西，显然如果 A 成立则 B 也应该成立，即如果取 A 则也应该取 B。但是，B 是对方“所不取”的，这就使得对方陷入“应该取而不能取”的自相矛盾的状况，从而反驳了对方。

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运用。墨经逻辑有巨大的生命力，只要从它对先秦以及秦汉思想家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西方的非形式的逻辑也是有生命力的，不然，为什么西方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么多重要的考试都要考它呢？我国 MBA 逻辑考试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因此，为了实现我国与西方国家所重视的非形式的逻辑学科的研究和应用接轨，我们也应该注意研究墨经逻辑。

沈有鼎指出：“《墨经》不仅在古代，就在现时，也还是逻辑学的宝库。”^①“作为逻辑学的宝库，《墨经》到今天还有许多东西没有被清理出来。”^②今天，我们应该遵照沈有鼎的这些重

① 《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3 页。

② 同上书，第 441 页。